

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袖的时代特征

张素玲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教研部 上海 201204)

摘 要:活跃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妇女运动大潮中的早期妇女运动领袖深受社会政治的影响,其个人生活和政治生命历程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家庭是她们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旅居、教育使其获得了有别于传统女性的主体身份,爱国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双重影响促使其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其成长经历了从学会、社团到党组织的发展道路,反叛与坚定寻求独立生活的意志是其精神特质,然而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她们的政治角色和活动也呈现出性别化的特色。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袖;时代特征

社会政治环境对于个体生命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第一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是一个卓越的革命群体,她们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命历程深受社会历史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早期女共产党员多在辛亥革命时期成长起来,这一时期,妇女解放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开始成为主流话语,女子教育得到国家提倡而迅猛发展,这使她们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渐成长起来的她们开始从新的思想资源中汲取动力,独立的个性与坚强的意志使她们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都敢于挑战父权制权威。在历史的裹挟之下,她们逐渐成为妇女运动的先驱,并成为第一批进入党组织的女性。她们入党后,通过创办妇女刊物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发动和组织妇女群众

开展解放运动。由于早期妇女运动领袖们的启蒙和影响,中国妇女开始觉醒,并在大革命时期掀起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使 20 世纪 20 年代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

一、家庭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政治社会化是指一个人获取政治定向以及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它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一个自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的社会政治人。对个体来说,政治社会化不仅使一个人形成了特有的政治观念,而且对一个人参与政治的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个体政治化中情感性的成分多在早年的

收稿日期: 2011-07-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领袖研究(项目编号: 05CDJ002), 长三角研究课题长三角地区女企业家研究(项目编号: celap2009-per-24)

作者简介: 张素玲(1970-),女,河南舞阳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教授,教育学博士。

社会化过程中形成。

家庭是社会成员最初、影响最为直接的政治社会化的媒介。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为社会的一员,最主要的生活场所就是家庭。与其他媒介相比,家庭在对人的、人格的塑造、基本人生观的形成以及政治常识的启蒙等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家庭关系影响着人们成年后的政治行为。

研究早期妇女运动领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可以看到,她们的家庭出身,大多不是来自于社会底层,而是士绅、知识分子或商人家庭,虽然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极为不同,如这些人中间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向警予、杨之华、刘清扬、缪伯英,也有来自日益没落的家庭,如王会悟、邓颖超等,但是都比较注重教育,家庭环境比较宽松,这使得她们自幼便养成了独立、乐观、爽朗、自信、自主的性格特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危机面前,这些家庭已开始逐渐走出儒家的传统世界,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和资源。向警予的父亲是一位商人,由于生意上的关系,与日本人有着频繁的接触,并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当时的留日浪潮中他先后送四个儿子到日本留学。和善的父亲和朴实的母亲使向警予一家成为受人羡慕的开明和睦的家庭,也使向警予自小就得到了父兄的照顾和关心,这对于向警予独立、自信性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杨之华的成长道路上,虽然传统观念深厚的母亲曾约束她的发展,可是,天性聪明活泼的杨之华却得到了来自父亲的支持。由于做生意,杨之华的父亲经常在上海、杭州等地走动,也与外商打交道,西洋文明也随之闯入了这个地处萧山的封建家庭之中。刘清扬所出生的家庭,因为是回族,在养育女孩子上没有儒家对女子的严苛要求,又由于刘清扬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自小就受到家人的宠爱。

与宽松的家庭环境相伴的是家人社会性别观念的变化,并成为影响她们成长的重要因素。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在这些家庭中,虽然强调女子教育主要是从识字中养成奉献牺牲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投注于未来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上,女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贤妻良母。但是,时代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思想传入国内,进步的社会风气和思潮还是影响到这些士绅阶层、知识分子和商人们,在对女子教育问题上其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向警予的哥哥从日本学成归国后,积极提倡新学,倡导男女平等,并向年幼的向警予讲述国外女界的英雄故事。王会悟的父亲是私塾教师,思想开明,他鼓励王会

悟追求教育,发愤读书。胡兰畦曾经追述辛亥革命时期她在成都的少时生活,那时,身边的女性全是母亲熟悉的亲朋好友,她们所具有的新思想与开拓社会工作的努力,让她深受影响。^[1]在男女平等的家庭环境中,刘清扬自幼便对男女共事和交际觉得习以为常,一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被家人送到天津最好的学堂读书。应该说,刘清扬个性张扬、自信独立性格的养成,健康而开放的男女交往观念与此家庭环境不无关系。缪伯英的父亲曾经于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尤为重视女子教育,参与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和女子职业学校,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缪伯英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男女平等的意识,激发了独立自强的信心。1917年当她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缪伯英已经是一位自信独立的新女性了。大多数女性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和教育,而另一些女性则从母亲那里汲取了前进的勇气和力量。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位自立自强的女性,坎坷曲折的人生并没有令她丧失生活的信念,相反,更激发了她坚忍不拔的性格特质,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独立在社会上开拓事业,这些对于幼小的邓颖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此外,这些家庭中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起到了重要作用。向警予的大哥学成回国后成为湘西同盟会成员,其后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五哥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家庭和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使向警予自小就萌生了献身民族国家的情感。待年事渐长,接触到先进思想之后,这种情感就转化为了坚定的行动意志。同向警予一样,刘清扬也是在浓郁的爱国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家族的生意在外国侵略者入侵天津之后受到极大影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感情自幼就深印心间。她的两个哥哥是天津报业名人,经常在家议论时政,谈论进步思想,也对反清革命深表同情,尤其是刘清扬的大哥曾经用秋瑾的例子教育和鼓励她,这些都培养和激发了刘清扬强烈的爱国思想。邓颖超的母亲在任教的学校中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萌发了爱国主义情感,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曾参与一些革命活动。总之,在父兄和母亲等的影响下,向警予、刘清扬、邓颖超等这些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幼小的心灵里已开始种下担当社会重任的种子。

二、旅居、教育与个体身份的获得

所谓身份是指个体所有的关于自身是其所有的

意识,是人们对(我)是谁以及他(们)是谁的理解。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把人格发展或者说自我的发展和身份的获得划分为八个阶段,其中,第五个阶段也就是青少年阶段是获得自我同一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个体获得了更多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信息,并开始对之进行深入的思考,考虑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将来产生内在的连续感,确定未来的生活策略。中国传统社会,女性主要的生活空间是家庭,社会交往范围局限在家庭关系中,身份建构亦源自于家庭,而早期妇女运动领袖们则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在家之外的社会舞台上获得了对自我的认识。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大多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传统的社会秩序正在迅速崩溃,这种变迁使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开始打破禁锢女性的樊篱,从家庭走向社会,她们的青少年阶段已与传统女性青少年时期所面临的景况大为不同。

首先,单独离开家庭并且移居异地是她们赢得个体身份的开端。对于当时大多数妇女而言,即使交通与治安都已不再是构成远离家门的障碍,但是移居外地还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在当时通讯很不通畅的年代,人的移动本身就创造了信息交换、观念传播和新身份确立的机会,因此,走出家门也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转变。女性走出家门,不是因为嫁人,而是为了增长见识和获得新知,这对于妇女传统的生活方式是重要的突破。而她们落脚的地方,往往和传统生活模式截然不同,是异于乡居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提供给女性更多接受教育、吸收新思想、新观念的机会。因此,妇女从旅行开始,家庭已经不再是她们身份的来源,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失去家庭关系,是她们在新的地方获得了个体的身份。离家、旅行、移居等物质环境的改变,成了她们接受新思想、实践解放的先声。

移居外地的行为,使年轻的女性们不断有机会接触外地男子。向警予离开家乡到长沙后,认识了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湖南激进知识分子,并参与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创立的新民学会,在这里,向警予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与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后来,在蔡和森的帮助下,向警予获得了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向警予的经历在其他妇女运动领导人的身上也得到相似的印证。秦德君,这位出生于1905年的四川忠县的女子,先是离开家乡到万县读书,后独自来到成都女子实业学校学习。五四运动中,秦德君是成都第一批三个剪去头发的女子之一。五四以后,她被学

校开除,便去了重庆,在那里结识了《新蜀报》的编辑,对方不仅提供给她栖身之所,而且将她引介给省内的知识分子。期间,她在泸州川南师范认识了时任教务长的恽代英。1920年,秦德君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和陈愚生并参加了他们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之后,她进入了这个革命圈子,并在李大钊、陈愚生和邓中夏的直接帮助指导下,相继来到上海、南京,进入上海大学、南京国立东南大学读书。1923年春天她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2](P9-23)}正是在四川境内和跨省的奔波中,在与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交往中,秦德君开始参与政治活动。胡兰畦离开家乡后,曾经在四川军阀杨森家作家庭教师,杨后来要纳胡为妾,并提出了各种资助,包括送胡到国外留学等交易条件,胡兰畦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断然拒绝了杨的无礼要求。一个年轻女子敢于反抗掌握权力的军阀,无疑,胡的行为显示了这一时期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反抗压迫的精神,要求主导自己生活的个性特征。之后,胡离开四川,前往上海,在那里,结识了陈望道、恽代英等革命者,后又到已掀起大革命热潮的广州,并以四川省妇女运动领袖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召开的妇女群众大会上,总结提出四川省妇女运动的报告,从此,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1](P92-100)}五四前后,就读于湖北女子师范的陈碧兰、杨子烈也曾离家远行。他们在武汉读书的时候,与进步知识分子有了更多接触机会,这种接触也为个人找到了今后行动的人生方向。陈碧兰与杨子烈都在回忆录中讲到了,她们在进步国文教师刘子通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李汉俊、陈潭秋、董必武等人,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其次,学校是他们政治社会化重要而有效的工具。一般而言,学校是孩子脱离家庭后所进入的第一个专门的社会化机构,没有其他因素能够与影响人们政治观点的教育因素相提并论。学校通过各种活动向学生灌输特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强化其对政治体系的情感,并对学生进行各种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培训,支持、扩大或改变青少年最初在家庭生活中所确立的政治认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学校中教师的政治态度和学校的对学生的管理方式、学校的各种学生组织都对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早期妇女运动领袖而言,这一时期,学校的大门开始向她们敞开,她们或进入女子中学或进入师范学校就读,正是在学校中她们逐渐确立了革命理想和生活方向,荡涤了胸襟,开扩了视野。由于这一时期的女子中学和师范学校都设立在省会城市、通商口岸或

者是县城,这意味着,为了求学就必须离开家庭,开始独立生活。因此,追求教育本身就成为她们后来独立生活的前提,使她们开始在心理和身体上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近代新式学校不仅是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场所,而且还是众多青年学子思想意识的引领者和塑造者。当她们进入学校后,所接触到的,是与传统女德、女诫极不相同的社会、政治、教育、心理、体操、音乐等新课程和新知识,校园氛围让她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感受,新式学校成为孕育新思想的摇篮。在学校中,她们开始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拜访,砥砺志向,探讨现代观念。1911年,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里,向警予等7个女孩子结拜金兰,同学之间的友谊成了她们以后探询革命道路的重要精神支撑。^{[3](P11)}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之外男性之间的友谊和联系历来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当女性走出家庭,同学之间的友谊同样对于她们的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它给了她们精神上的鼓励、情感上的安慰和思想上的认同。她们常常是依靠同学之间的联系和介绍,谋得工作机会,认识革命同志,同声相应,加入革命阵营。这些女性之间的社会联系与友谊不仅使她的生活更有意义,也是她们生活中重要的外部支持,是她们精神上的动力,它缓解了由于所选择的生活道路而带来的情感上的孤独与物质生活上的窘迫造成的压力,这也使她们在后来面对人生中的变故和痛苦时能够得到自我解脱。

总之,单身闯荡社会的女性开始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潮流之中,得到男性进步知识分子的援助,与其他女性相互联络,交换信息,这些不但开阔了她们的眼界,增强了她们闯荡社会的信心和勇气,而且使其逐渐摆脱了传统社会中女性依附的性别意识,摆脱了屈从的社会地位,建构起独立自主的社会身份,为其今后的个人行动找到了依循的方向。

三、爱国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双重影响

20世纪初期,中国处在清王朝、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国内动乱不已,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国际上中国外交接连失败,这一切带来了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严峻的社会政治现实爆发了以摆脱民族生存困境为目的的政治救亡运动,爱国主义在国内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中迅速蔓延并日益高涨。在学校,学生爱国运动、示威游行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大多自幼深受爱国主义影响,青年期经历了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她们和男学生一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成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五四运动

爆发后,向警予在家乡湖南溆浦率领自己的女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反对封建陋习,宣传革命道理。杨之华则在浙江的一所师范学校反抗传统礼教的禁锢。与此同时,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张若名等则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

在早期妇女运动领袖的成长过程中,女英雄的故事也深深激励着她们。这一时期,社会普遍期待女性的奋起,希望她们能像男性一样承担起国民责任,“巾帼英雄”成了人们赞誉的对象,“女豪杰”、“女英雄”、“英雌”等出现在大量启蒙文学读物与知识分子的言论中,传统文化中的女英雄花木兰、穆桂英等的故事深入人心,国外女英雄如法国的罗兰夫人,俄国的索菲亚也被知识分子介绍进来,成为被颂扬的人物。这些广为流传的人物,成了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寻找生活目标的榜样,为她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新的人生价值观、自我救赎和进入社会的机会,为她们打开了作为一个女人新的可能性。英雄主义要求担当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做民众思想和行动的引导者,如果需要牺牲,则毫无畏惧地放弃自己的生命,通过认同这些女英雄,早期妇女运动领袖们希望能够摆脱传统社会中延续了千年的屈从地位,证明她们的能力。向警予年幼时就以花木兰的故事激励自己,希望像花木兰一样金戈铁马,抗击外国侵略者,以自己的生命报效国家。溆水河边,她经常带领一群女孩子,高声背诵《木兰辞》。刘清扬的哥哥刘孟扬曾经给她看过一张秋瑾的照片,并介绍了这位巾帼英雄的传奇经历与气概。刘清扬为秋瑾的悲壮事迹所感动,她暗下决心,要做一个秋瑾式的爱国女英雄。^{[4](PP14-51)}

女英雄之所以广受关注和敬重,除了爱国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女权主义思想的传播也是重要的原因。女权主义思想自清末开始在中国兴起,到五四时期得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大力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各种社会思潮的论辩,报刊杂志的广泛宣传,使这一时期个性主义思潮勃兴,正是在这种浓郁的思想解放氛围中,妇女解放、女权主义成为社会舆论的一大兴奋点。其时,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妇女问题的大讨论,对于女子人格独立、大学开女禁、男女社交公开、恋爱自由与婚姻自由、家庭改制、女子参政、女子经济独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种舆论氛围和思想传播无疑对当时女性产生了极大影响,女性的主体身份和平等地位开始成为革命女性的诉求,这一诉求集中体现在同尽国民责任上。通过承担与男性同样的责任,她们希望能成为与男性地位平等的人。1919年8月23日,刘清扬、郭隆真等作为天津各界

联合会代表,与北京、山东的代表到总统府请愿,要求解除山东戒严,惩办枪杀爱国群众领袖的山东省长马良。结果,全体请愿代表25人都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警方为分化请愿代表,通知刘清扬可以取保释放,被刘清扬拒绝,并表示愿与全体被捕代表共患难、同生死,坚持斗争到底。她说:“我此番是奉母命救国,且男女同为国民,理应与男界同受甘苦,即便死于厅内,我等亦甘心。”^[5]从刘清扬的话语中,可以见到她勇于承担新角色的坚定态度,作为国民,她要与男性同样承担国人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总之,深受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她们开始挑战父权制权威,关注妇女解放事业,并逐渐成为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先驱。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女权主义的广泛传播、妇女运动的政治意义以及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寻求,成为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参加和推动妇女运动的动机和目标。

四、从学会、社团到加入党组织的成长之路

同辈群体是具有大体相同的教育程度、社会经济背景或某种意识形态背景、兴趣爱好相近的自愿组织。同辈团体是一种特殊的群体,它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结构,具有限制和陈规较少等特点,但在一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特别是对青少年的观念、态度的形成影响重大。学会和社团是同辈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成员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参与性、社团氛围的民主性和社团自我价值体系的形成性等特点。学会、社团等的主体往往与政治社会紧密联系,它可以沟通成员与政治社会的联系,加速成员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不仅如此,在社团内部,社团成员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社团开展讨论时,可以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平等地交换意见、展开争论,有较为浓厚的民主气氛,这对于培养成员的民主意识和平等理念至关重要。最后,在社团成员的密切交往中,社团还会形成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和亚文化系统,并传递所属团体的政治文化,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人际传播,无形中得到相互影响和渗透。

从早期妇女领袖加入党组织的路径和模式来看,她们从五四时期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先驱到党员的转变与男性是相似的,对他们而言,加入学会是关键,这些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一开始大都是参加一些由男性创办的学会如新民学会,觉悟社等。新民学会1918年4月由12个男性创建,五四游行示威运动后,即开始接纳女会员,到1920年早些时候,在六七十名成员中至少已经有14名女性会员。同样,在觉悟

社,1919年9月,创立觉悟社的80名天津学生中有5名是妇女,之后,女性的比例占到了50%。觉悟社中的妇女在随后几年时间里逐渐加入了共产党。与此同时,一些妇女组织的成立也成为培养妇女解放意识,参与革命的重要阵地,如成立于1922年10月的女权主义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女子参政协进会”等,这些组织及其所发动的活动,培养了她们的性别平等意识,锻炼了从事妇女运动、发动群众的能力。

尽管如此,她们与男性也存在差异。对于男性党员而言,妇女解放问题并不是一个急迫的促使他们加入党组织的理由。而对于早期妇女运动领袖而言,除了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抱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外,促使她们加入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就是性别问题。著名政治学家伯恩斯曾经在《领导论》中精辟地指出,对爱和归属感的需要,结合社会作用与政治力量带来的影响,有助于形成各种各样的领导形式和社会组织。在这样的小群体中,亲密、稳定与充满感情的关系产生的温暖可以补偿家庭所剥夺的关爱。其中,成员共同的使命感,以及共同面对的迫害和危险,能够产生团结一致和相互支持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足以满足因离开和反叛家庭而导致的情感饥渴。^{[6](P62)}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及党内知识分子关于性别关系的宣传倡导,使党组织开始形成一种变革传统的性别关系、挑战传统文化的亚文化群,这成为吸引早期妇女领袖参加党组织以实现人生抱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整个社会的性别关系还是传统的模式,女性的生活空间只局限于家庭领域时,中共党内的性别平等给这些女性提供了反抗传统性别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机会,为她们提供了一个支持的环境,而对于她们而言,外部环境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的确,对于那些希望挑战传统的性别关系,梦想新的生活方式的女性而言,党不仅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且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文化环境。首先,它激励和促使她们努力反抗家庭的高压和专制,冲破包办婚姻的束缚。在当时男女性别严重隔离的社会状况下,党内的同志,可以以一种自由公开的方式共同工作。例如,杨之华正是在共同的艰苦工作中,开始和瞿秋白逐渐走近、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爱情,也正是因为党内倡导的妇女解放的政治文化环境,才使她得以最终获得勇气摆脱早已失去了爱情的婚姻。其次,在党的亚文化中,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尊严感,对于她们加入政治组织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的确,在那个政治活动领域还是属于男人的时代,进入政治组织本身

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给予了女人进入社会变革前沿的机会。

这个由共产党党员创建的具有浓郁政治氛围和宣传妇女解放的机构深深吸引了早期妇女运动领袖,使她们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事实上,对于这些女性而言,一旦进入激进的圈子,就难以再回到大部分妇女所具有的共同的社会环境中,因为那意味着退缩和屈服,同时,传统保守的社会也难以再容纳这些女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党组织给她们提供了思想和行为的安身之处。高君曼当年不顾家庭反对,嫁给陈独秀之后,就意味着她与家庭的决裂。多年后,伤心欲绝的高君曼离开陈独秀,独自开始艰难地生活,直到她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她的家人依然无法原谅她。当她们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反抗,退婚、罢课、退学、和不同男性开会、工作、集体出入,这与当时一般妇女的生活是极为不同的,也因此导致传统社会的排斥,而这种排斥进一步促使她们产生内聚于进步分子团体的倾向,也因此,她们与外界环境就表现出了明显的疏离,结果是恋爱和婚姻对象在这样的团体内发展。排斥过去的生活是痛苦和困难的,新的世界已经打开,旧的世界却是再也无法回去。在转身的刹那,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她们此后的人生道路。她们在新的生活中、在跨越了性别樊篱的革命运动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并在这里得到了补偿。

五、反叛与坚定寻求独立生活的意志

早期女共产党员在其成长过程中,大部分女性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不断反抗歧视、束缚女性的观念、陋俗,与传统的命运进行抗争。在少年时期,她们拒绝裹足。不缠足是女性得以走出深闺幽阁、投身社会,从而获得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重要身体条件。青年时期,反抗传统的管理方式,在革命浪潮中或以退学结束学业,或投入激进的团体中。与此同时,她们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早期女共产党员向警予、郭隆真、杨之华等,为了冲破不幸婚姻的束缚,普遍进行了反抗,从而争取到自由之身。她们要求结束包办婚姻的方式亦非同寻常。向警予曾亲自前往驻军司令家中,断然拒绝司令的求婚。郭隆真在结婚当天在夫家当众宣讲包办婚姻的危害,之后,决然而去。^{[7](P188)} 杨之华选择在上海《大公报》登报宣布离婚。刘清扬则是用考试的办法吓退了家庭为之选择的夫婿。刘清扬的女儿这样回忆她的母亲:“我母亲意志很坚强,而且能够非常肯定她要什么和不要什么。1916年她的亲家来我家,要求履行婚约,母亲一口拒

绝。她母亲根本不强迫她遵守婚约,我的伯伯也全力站在母亲那方。最后母亲作个建议:她要给对方一个考试。她出一个题目,男女双方就此各作一篇文章。如果男方的文章比她优胜,她就嫁给他。对方被她搞得心烦意乱,刘清扬的哥哥便乘机安抚对方,劝服他们取消婚事,对方只好知难而退”。在中国戏曲里,宋代著名词人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一位美丽、富有才学的女子,考试爱慕她的青年男子秦少游,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浪漫美好的爱情故事。不过,这一次,不是戏曲,没有充满吸引人的情趣故事,而是一位激进的女性,考试她的被家庭包办的追逐者。事态按照刘清扬的意愿发展,最后顺利结束了这门婚事。总之,早期女共产党员背叛封建婚姻制的历程,是一个由不自觉地自觉、不成熟到成熟、个体到群体的历程。

早期女共产党员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背景,无论是贫穷抑或是富有,她们年少时大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即改造社会。她们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勤工俭学,尽量避免对家庭的经济依赖。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组织女子参加工读互助团,向警予、蔡畅、郭隆真、刘清扬等,则怀着“作大事业,须大准备”,以担负“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的雄心来到法国,她们一面到工厂做工,一面进入法国女校学习,“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她们通过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从而奠定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和目标,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由家庭走向社会,改造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是这些女性的远大抱负。在她们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她们内心充满了同情心、正义感和责任感,现实的满目疮痍触动着她们原本具有的叛逆之心,她们把目光由家庭投向社会,把社会看作实现她们价值和意义的表征,并把她们的价值取向定位于改造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向警予在给父母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把自己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最佳的实现。在向警予看来,个人人生的最大价值就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1919年经过五四运动洗礼之后的向警予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而到了上海。12月30日,在她给好友陶毅的信中,明确提出,“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应当担负的。”尤其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她们的人生航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向警予到享有革命和民主盛名的法国后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到“党以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她怀着“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的迫切心情阅读法文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开始了认识上的飞跃。早期妇女运动领袖作为参加革命

的主体，正是这样以她们独特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表现了她们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政治责任。

六、性别化的政治角色

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在党组织内的生活和她们的政治活动，也显示出，党的组织机制和政治实践受到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影响。从男性党员关于妇女解放的宣传和倡导中，可以看到男性在话语上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党内的组织建构也显示出是一个男性主导的权力机构。除了在妇女部任职之外，在早期党组织中，女性党员很少有机会进入重要的决策位置，新创立的政治组织内部出现了性别化的分工。

早期男性党员不遗余力地倡导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些党内男性领导依然存在着传统的父权制观念，保持着对于传统性别角色的期待，既主张妇女解放和开创新的社会性别关系，又对现存的社会性别等级习以为常。早期男性党员既激进又传统的思想矛盾成为妇女领袖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这种环境也由此形成了早期妇女领袖的政治思维模式，使其在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实践与个人生活中遭遇到困境。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多年以后，依然在发泄对第一个妻子高大众的愤怒。当陈独秀决定到日本留学，希望高大众能用她的嫁妆资助他留学时，他的妻子拒绝了，陈独秀愤怒之极。无疑，在陈独秀看来，他的学习要远比他的妻子放弃大部分嫁妆要重要得多。其后，在和高君曼的婚姻上，陈独秀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在理论上，陈独秀的批判是激烈的；在生活中，他的行为是开明的。但在婚姻权利与责任的统一方面，陈独秀对个人婚姻性爱问题的处理却存在着理论与行为脱节的情况，封建士大夫的所谓“名士习气”在陈独秀身上依然残存。

在妇女问题上，茅盾很早就加入争论，并持有一种浪漫积极的立场。早在1919年，他为《妇女杂志》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针对该刊的“贤妻良母主义”而声称：“我是极力主张妇女解放的一人”，鼓吹“让妇女从良母贤妻里解放出来”，甚至主张没有家庭的形式。这些激进的论调带有当时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是茅盾并不讳言：“男人要把改良社会促进文化的担子分给她们，妇女要准备精神学好本事来接这担子，这才称是真解放，这样的妇女，便是解放的妇女。”在具体所提的要求中，妇女应当确立高贵的人格和理想，了解新思潮的意义，还包括：“希望她们的活动不出于现社会生活情形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外。”^[8]由此看来，他的

妇女解放的激进高调仍然是有限的，是与现存社会秩序相配合的。

中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直到晚年，依然对在莫斯科的往事耿耿于怀。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对当年陈独秀决定让他和刘清扬一起参加共产国际的大会颇为不满，在他看来，刘清扬的行为是不适宜的。1924年，陈独秀决定派刘清扬和彭述之去莫斯科参加第5次世界大会。那时的刘清扬刚刚从法国回来，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党员之一，并在之前的学生运动中广为人知。她口才很好，富有热情，拥有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受过良好的教育，留法经历使她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对于彭述之而言，刘清扬却是一个直率和尖利的人，他认为，她在文化上不足，政治上粗鲁，作为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一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说道：“在我和她一起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月里，我把她看得很仔细。她是个不停说话的人，惟一目的是炫耀她的存在和价值。姓邓的那位铁路工人，是个粗豪的北方汉子，也不能忍受刘清扬的态度。唉，和她在一起真是倒霉！”^{[9](P181-82)}彭述之承认刘清扬自五四运动以来所迸发的光芒，但却无法忍受围绕刘清扬的喝彩。在彭述之的回忆里，刘清扬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女性，令彭感到压抑和不自在。而在自己的爱侣张申府的认识里，刘清扬是他发现、教育和送上革命道路的女性，在张申府的心目中，他们的角色是固定的：他是带路，她跟随，他是脑，她是心，她听他指挥。罗素女儿曾对此深刻地指出：“女权运动者为争取女性福利而设法改变法律和习俗时，他可以完全既通达又投入，既大公无私又面面俱圆；许多女权运动者是、而且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你不需要明白女人的心就可以为她们争取权益。女权运动者甚而不须理解女人。”^{[9](P103)}

在早期中共内部，男性党员的社会期待对于形成这些妇女的政治角色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妇女自身的自我定位对于决定接受这种政治身份也有推动作用。妇女解放是刺激当时激进妇女加入党组织的强大力量，但是传统的妇女形象继续影响并形成了妇女的政治身份，这一时期，早期女党员朝向了照顾者和服务者的角色——这些角色似乎与她们的自我形象是吻合的，她们被赋予了许多想当然的职责和不被重视的任务，这些任务被认为是妇女作为母亲和照看者的传统角色的扩展。一方面，她们仍然承担着体现传统性别分工的工作，这些工作大多是非决策性的具体行政事务，从而成为党内女性行为的界限。向警予，这位卓越的妇女运动领袖，在1922—1925年间负责管理

中央委员会的日常生活,因为党内认为她比男性同事更善于做这类事情。^{[10](PP180-181)}通过做男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些女性参与到构建党内女性的经验和行为中,也参与到建构性别化的政治身份中。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性别特征影响到妇女,并形成了她们的政治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她们并没有要求男性分担家务,家庭和育儿的重担严重阻碍了妇女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一旦女性开始生育孩子,就不得不重新安置他们的生活。因此,那些在党内成为重要领导人的妇女或是送她们的孩子给亲戚照顾,如向警予、杨之华、刘清扬;或是选择不要孩子,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如邓颖超等。她们以此来维护和发展作为领导者和权威所需要的自尊感。

当然,对于大多数早期女党员而言,新的革命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一个进入党组织的重要理由。党组织成为她们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依靠,他们在这里组建家庭,和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一道工作。与作为传统的妻子和母亲相比,为党工作提供给予她们更广

阔、更有意义的生活,同时在党内,这些女性也可以得到更多更大的空间促进个人发展,发出自我的声音。

参考文献:

- [1] 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2] 秦德君.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3] 丁玲.丁玲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 [4]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女杰(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 [5] 益世报(天津),1919-08-29.
- [6]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导论[M].常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7]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粹[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 [8] 佩韦:《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J].妇女杂志,1919,(11).
- [9] 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 [10]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李冲锋]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PC Leaders of Women Movements in Early Times

ZHANG Su-ling

(Department of Academics,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Shanghai 201204, China)

Abstract: Leaders of early women movements in the 1920s with the tide of Chinese women movements were affected by the social politics at that time, therefore, their personal life and political life presente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Families we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mpacted on their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ravel and education embodied them with identiti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females; patriotism and feminism promoted their participating into women liberation movements. They grew up along the path from societies to party organizations, so that they obtained spiritual qualities that rebel th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firmly seek an independent life. But,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ir political role and activities also showed gender-based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CPC; early women movement; lead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